

连接党中央和鄂豫皖苏区的红色地下交通网

□徐 涛

鄂豫皖苏区创建后，为了确保与革命根据地的紧密联系，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部署、指挥下，鄂豫皖苏区在周边迅速建立起星罗棋布的秘密交通站、联络点和交通线，并培养出一大批忠诚勇敢、不畏牺牲的交通员，短时期内构建出一张紧密连接党中央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地下交通网络。

多条红色交通线的诞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要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的号召，在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组织的同时，着手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和工作机关。经过不懈努力，到1930年，中共中央克服重重困难，基本恢复或建立了中央通往各苏区、各苏区通往各县、各县通往各乡的交通线。

1930年6月，湖北、河南、安徽三省的党组织分别举行了黄麻、商南、六霍等武装起义，创立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进而正式形成了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在通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路线上建立了东、西两条秘密交通线，以及由中央交通局直接掌握的北方线和长江线。

东线直接隶属中共中央，在武汉、开封和安庆都建立了中央交通总站，其主要任务是为中央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搜集安徽皖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报，并承担传递文件、接应干部和输送人员的工作。在上海至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咽喉——合肥县店埠镇老街北头的一家杂货店内，专门设立了中央交通中心站，下辖4个分站，分别是：正阳关分站（寿县）、思古潭分站（六安县）、山七里河分站（舒城县）、皖河分站（潜山县），配备有交通员20多人。其中正阳关分站由中共皖北中心县委书记

李天乐担任站长，以开设香烟铺作为掩护，交通员李和则以店员的身份，用进货、催账的名义往返于上海、正阳之间。该交通站曾护送过舒传贤（六安中心县委书记）、方英（六安中心县委委员）以及皖西北特委主要负责人来往上海等地；护送过沈泽民等鄂豫皖省委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安全进入根据地。

西线穿过交通便利的武汉，革命群众基础较好。护送中央来人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任务，多由武汉交通站承担。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部分交通站和秘密掩护机关遭到破坏。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派人将出发前往根据地的几批同志追回，并迅速撤离顾顺章走过和可能知道的交通线沿线人员。鄂豫皖省委也迅速采取应变措施，重新布置新的交通线。不久，时任鄂豫皖省委书记的沈泽民向中央汇报：“现因傅朝璋（时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由河南省委来苏区（即鄂豫皖根据地）之便，我们就和他约定要他负责布置交通线，办法：中央来人由交通（员）送至郑州交通站，把人交给郑州交通站，即由郑州交（通）站送至信阳交通站。”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情况，“一路不经过河南省委，直接与苏区发生关系，我们另外再与河南省委建立直接交通，也和信阳特委不发生直接关系”，具体路线是“由信阳至广水经孝感苏区边境入苏区”。此后，一条“经郑州、信阳、罗山（或广水）、孝感交通站再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西线交通路线被建立起来。

北方线、长江线经吴德峰（时任中央交通局长）亲自部署，所通达的地区为：由上海到天津后与北方局联系；上海经郑州、驻马店转入鄂豫皖根据地；由上海至河南，与陕西省委联系；从上海经合肥、六安达到鄂豫皖根据地。

编织红色地下交通网

由于鄂豫皖苏区长期处在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武装的封锁和“围剿”之中，已经建成的交通线经常遭到敌人的破

坏。为了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络畅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周边的地方党委采取多项举措建立交通网。

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临时组织大纲》中专门设立了交通委员会，下设有赤色邮政局、电报局、交通站（驿站）、水上交通处。

根据地各级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迅速开展行动。中共鄂豫皖特委专门成立交通局，在长江线因敌人的“围剿”中断后，立即改为从信阳等地接受“指示与消息”，并积极尝试“在长江路线外要建立各处交通网”。

中共京汉区特派交通员卢华银在应山县高店柴家岗、西萧店、天子岗都堂湾、寿山、郝店等地分别建立了联络站，这5个联络站与广水、灵子庙、草店等地的联络站一起，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地域性地下交通网。中共信阳中心县委选择在郊区和潢川、息县等地设立多处联络站，并派出精干人员，加强和整顿了多个联络站、点，很快建成了拥有严密工作体系、遍布各区的交通网。

在蒋介石调动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时，中共豫南特委为解决信阳“城内交通联络站活动困难”的紧急情况，迅速启用多处农村交通站，继续保持与根据地的联系，并巧妙地利用城内“已被敌人搜查过”的联络点，继续接待来往人员、传递情报。

中共皖西北特委为加强对交通工作的指挥，派巡视员黄伯零专门巡视皖北中心县委的工作，不仅很快健全中心县委与根据地的交通关系，还帮助阜阳县委在西乡以长官、曹寨、沈丘为中心，建立了一条拥有18个联络点、从皖北通往鄂豫皖根据地的“备用转送交通线”。

红军皖西教导第二师奉中央军委的指示，按照指定的地点，派人到安庆、芜湖、蚌埠、徐州、正阳关、合肥建立了相应的秘密军事交通站（军事通讯

处），形成了一张“军事交通网”，为保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与中央军委的联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交通员：红色地下交通网的捍卫者

交通员肩负着护送人员过境、传递党的文件、搜集敌人情报、购运重要物资、帮助扩大红军等多项重要任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及周边各级党委对交通员的选拔极为严格：一是要求政治坚定；二是要求熟谙业务；三是要求自觉执行党的纪律，任劳任怨。凡是派往根据地的交通员，一律不进入根据地中心地带，而是在“赤白交界处”围统区一侧的秘密交通站内，护送干部以及传递文件、物资和资金均在交通站完成交接。

各级交通员走上岗位后，严格遵守中共中央和苏区及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以“职业化”和“社会化”作为身份的掩护，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中间，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他们建立的交通站可能在学校、书社、药房，也可能在医院、商店、旅社，更可能在茶楼、饭馆、作坊……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往返于上海、中央根据地和鄂豫皖根据地，把文件藏在竹扁担里、暖水瓶中、镜子里、鱼肚子里，以及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把情报用药水密写在纸上、衣服上、布料上、书本上，突破了敌人的层层封锁……为了捍卫红色地下交通网，很多交通员不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摘自2022年12月8日《人民政协报》）



行进中的志愿军战士

强行军是以加快速度和延长时间方式实施的行军活动，通常在奔袭、追击、迂回、摆脱敌军或遂行其他紧急任务时采用。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因长期处于装备劣势，基本上只能采取徒步方式组织行军。特别是在战况激烈、时间紧张、任务急迫之时，我军为夺取作战胜利或保存革命实力，经常在恶劣战场环境和敌军重兵威胁之下实施连续数日、长途急速的强行军。

然而，正是在缺少车辆等机动装备的不利条件下，我军先辈靠着一双双“铁脚板”，跑赢了坐在轮子上甚至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从飞夺泸定桥，到奔袭威远堡，再到渡江战役千里追击，我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昼夜行军百余公里的战争奇迹。至今，世界战史上强行军的最高纪录仍由我军创造并保持。

1950年11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西线战事打响。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指挥第38军于26日夺取德川后，速令第38军继续以主力向院里、军隅里方向进攻，以一部插向三所里，堵住敌人南逃之路，以实施战略迂回。27日黄昏，第38军军长梁兴初接到命令后，深知穿插任务是完成整个战役目标的关键，遂命令所部第113师沿德川以南的小路向三所里强行军。

三所里是朝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处于美军第8集团军腹地之中，南临大同江，周边地形复杂。村西有一条由平壤通往价川的公路，既是西线敌军前后方运输补给的交通枢纽，也是西线敌军主力北进和南逃的必经之路，乃敌方防御部署的薄弱之处。同时，公路两旁连绵起伏的高山，便于设伏阻击敌人，达成战役突然性。这正是志愿军司令部下令先敌穿插三所里的原因。

第113师要想穿插三所里，可谓困难重重。短时间内需行军72公里，不仅沿途山路崎岖，还随时可能与美军3个主力师正面遭遇。而此时第113师只有十几门迫击炮和少量反坦克手雷，打击与机动能力均非常有限。

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第113师在苦战德川尚未休整的情况下，仍然迸发出攻坚克难、连续奋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过一夜强行军，第113师全体指战员仅用14小时便疾行了72公里，于28日早8时许抵达三所里，旋即分兵一部抢占三所里旁的另一处交通要地龙源里。至此，第113师在美第8集团军北进南撤要道上堵住了一道最重要的“闸门”，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西线战场的后续一系列战役行动取胜创造了至关重要的条件。

在得知三所里被我军占领后，西线美军于29日全线撤退。败退下来的上万名敌军，被拦阻在军隅里至龙源里的狭长地带。第38军主力立即对围困之敌进行猛烈攻击，同时第113师在强行军后仍能快速投入作战，牢牢坚守三所里、龙源里，为主力部队开敌提供了重要保障。经过8个昼夜的围歼战，第38军消灭南朝鲜第7师，重创美2师、美骑1师，歼敌8000余人，俘敌3600余人，缴获汽车1500余辆、火炮300余门、坦克14辆，为实现整体战役意图立下头功。此战胜利后，彭德怀于12月1日与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等志愿军首长联名向第38军发出嘉奖令。

实际上，72公里只是图上测量的直线距离，第113师的真实行军距离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他们需要一边快速行军，一边打遭遇战，击败沿途多股南朝鲜军的散兵，才能一刻不停地向三所里

人民军队的『铁脚板』

□黎旋 张苗

狂奔。为躲过美军数十架飞机在头顶上不停地低空侦察，战士们必须反反复复地疏散隐蔽、跃进奔跑。最苦最难的莫过于炮兵和辎重分队，他们被火炮、弹药、物资压得直不起腰，仍寸步不离地紧跟步兵分队。一些战士跑着跑着突然倒在地上，就此长眠。而在翻越海拔1250米的长安山时，所有的干部冲锋开路，战士们结成一长串人链互相拖拉前进，以此来抵抗夜晚山上刺骨的寒气。

此战，第38军赢得了“万岁军”的光荣称号，而夜行百里、穿插敌后、断敌退路的第113师所创造的强行军纪录，或许唯有邓华的“奇迹”二字足以评价。正是在1950年11月27日的这个夜晚，第113师凭借非凡的精神力量，突破人体生理极限，在山路险阻、夜暗不明、天气严寒的朝鲜战场上，用一双双“铁脚板”战胜了汽车轮，创造了一个至今未被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突破的战史奇迹。即便是在199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海湾战争中，拥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英军队在平坦通畅的伊拉克沙漠上，面对已然溃不成军的伊拉克军队，乘着重型装甲车辆快速实施机械化行军，4天也只跑了274公里的路程，平均每昼夜行程不足70公里。

今天的人民军队装备建设水平空前提升，基本实现机械化，组织强行军不再需要采取徒步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军不再需要“铁脚板”。“铁脚板”是一种精神，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无畏胆量，是逢敌亮剑、敢打必胜的英雄气魄，更是深植于人民军队体内的红色基因。

（摘自2022年12月29日《中国国防报》）



冼星海：人民的音乐家

□罗艾桦

冼星海，原籍广州，1905年生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出生前父亲已去世。7岁时，他与母亲侨居马来西亚谋生，在新加坡养正学校上学，其间参加该校管弦乐队的活动。1918年

回国后，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后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1928年，冼星海进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发表了著名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

1929年，冼星海赴巴黎勤工俭学，1931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留法期间，冼星海创作了《风》《游子吟》《d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10余首作品。

1935年回国后，冼星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具有战斗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

1938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创作了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公演。5月11日，在庆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晚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看了由冼星海指挥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后，连声称赞。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看过演出后，于7月8日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在延安期间，他还创作了《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作品，以及《三八妇女节歌》《打倒汪精卫》等大量歌曲。1939年6月，冼星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5月，冼星海去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后因战争、交通阻隔而羁留。其间，他创作了交响曲《民族解放》《神圣之战》，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提琴曲《郭治尔—比戴》等。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他肺病加重，1945年于莫斯科病逝。延安各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哀。”

（摘自2021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罗少伟率部夜袭韩村集

□郑学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罗少伟所在部队在杨得志的率领下，出太行，过平汉线，挺进直南（包括现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豫北地区，开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六八八团与活跃在该地的中共抗日武装组建为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崔田任政治部主任，卢绍武任参谋长。罗少伟被编在一大队，开赴鲁西南开展游击战。罗少伟随部队活动，曾参加夜袭金乡城、袭击徐庄日军车队等著名战斗。由于作战勇敢顽强，罗少伟很快成为连长。

1940年，罗少伟随部队进驻山东曹县。此时，曹县韩村集驻扎着一支日军部队，四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日军的暴行，老百姓恨之入骨。冀鲁豫军区决心拔掉这颗“钉子”，为群众除害。罗少伟主动请战，要求完成这个任务，得到批准。

罗少伟随即派出侦察员，化装前往敌人据点周围，对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地形等进行了侦察，并解救出一名从日军据点里逃出来的妇女。根据掌握的情况，罗少伟制定了一个“擒贼先擒王”的作战计划。

行动当晚，罗少伟带领部队

乘着夜色秘密出发，很快来到村外。罗少伟让全连埋伏在村子周围，自己带领一个侦察班化装成老百姓，由被解救妇女带路，悄悄进入村子，来到设在村内地主大院的日军指挥部外。罗少伟指挥战士们消灭了敌人的岗哨，自己独自一人翻墙入内，蹑手蹑脚爬上日军指挥官宿营的房顶。他轻轻揭开瓦片，看到日军正在酣睡，于是把随身携带的集束手榴弹拉开弦扔进屋内，然后敏捷地一跃而下。只听一声巨响，集束手榴弹在屋内爆炸，正在睡梦中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手榴弹的爆炸又引发了室内存放的炮弹和炸药，爆炸声此起彼伏，火光冲天，敌人指挥部变成一片火海。埋伏在村外的战士听到猛烈的爆炸声后，立即冲进村内，和敌人展开激战。各处敌人失去了指挥，慌了手脚，很快被分割包围。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将村中100多敌人全部消灭，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

此次战斗，首创了八路军在“鲁西南全歼日军据点的范例”。战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签署命令通报表彰，号召根据地全体军民学习罗少伟的英勇事迹。

（摘自2022年12月8日《人民政协报》）